

才子佳人理想模式的嬗变及其现实冲突

——从《金圣叹批本西厢记》看金圣叹的婚恋观

■ 余晓莲 谷冬梅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是明末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苏州长洲县人,一说吴县人。)在元杂剧《西厢记》的基础上评点、修改、增删、润饰而成的金批本《西厢记》(又名《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版本问世之后流传甚广,是近三百年间最受读者欢迎因而翻印最多的本子,越剧《西厢记》和京剧《西厢记》均以它为依据。《西厢记》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学者们研究金本大都立足于金圣叹的评点技法、哲学思想、艺术手法、人物批评等,笔者则着眼于其婚恋观展开论述。

一、才子佳人配——爱情中男女的理想配对标准

金圣叹认为男女爱情来源于上天的安排,并且有一定的配对标准。媒妁在撮合两户人家时首先考虑的是“门当户对”,上天则倾向于才子配佳人,即男才女貌,而且并非一般的男才女貌。金圣叹在《琴心》的总批里写道:“夫张生,绝代之才子也;双文,绝代之佳人也。”接下来又写道:“夫才子,天下之至宝也……即以彼一宝配此一宝者也。”又写道:“以绝代之才子……此亦必至之情也。”人们总喜欢把爱情的降临归为缘分,这是对爱情的产生伴随着强烈的美感体验而无法解释的解释,并很容易认为由掌握着过去、现在、将来的上天来安排。金圣叹并不例外,他惊叹于张生和崔莺莺的美妙邂逅,同时唤醒内心深处的爱情理想:对才子配佳人的认可,对美丽爱情的无比仰慕。

金圣叹对才子张生很是钦佩。他在《读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五十五条写道:“《西厢记》写张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门子弟。异样高才,又异样苦学;异样豪迈,又异样醇厚。相其通体自内至外,并无半点轻狂、一毫奸诈。年虽二十有余,却从不知裙带之下有何缘故。虽自说颇不刺的见过万千,他亦姿势从不动心。”从对张生的肯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才子的要求:首先要才性高,其次是道德高尚。另外,金本的张生更加执着于爱情。他对崔莺莺始终钟情、痴情、专情、纯情。每一处张生对崔莺莺的思念之情都倾注了金圣叹欣赏的笔墨。

跟对张生的欣赏相比起来,金圣叹喜爱崔莺莺之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文,天下之至尊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灵慧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矜尚女子也。”金用至尊、至有情、至灵慧和至矜尚来形容崔莺莺,基本上概括了崔的品行,后世对崔的评价也都沿袭这几方面。为了达到崔莺莺形象的完美呈现,他对旧本崔莺莺进行一定修改,让她的言行举止更加符合一相国小姐应具备的尊贵和矜持。在《酬简》一折,【么篇】和【后庭花】之间的科白,崔莺莺对张生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金圣叹将这些话删除。两人成就合好之后崔莺莺说:“我回去也,怕夫人觉来寻我。”改为红娘请小姐离开:“小姐,回去啦!怕夫人觉来。”而让莺莺自始至终保

持不语。于是,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矜持女性跃然纸上。

金圣叹认为是出于他人之手的第五本之一《捷报》的总批里,他这样批莺莺:“只如此篇写莺莺……盖佳人才子,至此一齐扫地矣。”自古以来女性的情感需求比男性更为细腻、敏感、持久,王实甫了解女人这一大性,可是金圣叹并不关注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崔莺莺哭哭啼啼有失身份,是对才子佳人形象的破坏。传统的才子佳人中,女的要有闭月羞花之貌,男的要风流潇洒之俊姿,但是金圣叹更倾向于男女双方行为方式的要求,正所谓是一种“气质”之美。

二、先王制礼——认同与矛盾

崔莺莺和张生在道场一见钟情后开始面临一系列阻挠。金圣叹将其原因归结为先王制礼。在贼警之前,崔莺莺张生产生爱的火花而未能将至情通之于对方,因《礼》使然。“而才子终无由能以其情通之于佳人,而佳人终无由能以其情通之于才子。何则?先王制礼,万万世不可毁也。《礼》曰:外言不敢或入于闾,内言不敢或出于闾。斯两言者,尤有照鉴,如临鬼神。童而闻之,至死而不容犯也。……是故男必有室,女必有家,此亦古今之大常,如可以无讳者也。然而虽有才子佳人,必听之于父母,必先之以媒妁。”又“此见先王制礼,有内有外,有尊有卑,不但外言之不敢或闻于内,而又卑言之不敢或闻于尊。”金圣叹认为先王制《礼》古已有之,并承续至今,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认为男女双方遵照《礼》来行事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并不拘泥于《礼》来看待崔张爱情,甚至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情和礼的矛盾。金圣叹欣赏和推崇崔莺莺作为一个相国千金小姐所拥有的守礼和矜尚品质,而在崔莺莺对红娘一度加强警惕的情节上他这样写道:“盖圣叹于读《西厢》之次,而犹犹然重感于先王焉。后世之守礼尊严千金小姐,其于心所垂注之爱婢,尚慎防之矣哉!”可见,金圣叹认为先王制礼让人们在一个有着严谨秩序的人伦社会生活中,这是不能随意违背的,同时又意识到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满意其对一切合理行为的严重束缚。

三、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先扬后“改”

金圣叹腰斩了旧本第五本,他认为《西厢记》至《惊梦》一折则“为一部一十六章之结,不只结‘惊梦’一章也。于是《西厢记》已毕。”历代的学者们对《西厢记》最后一本的说法不一,有不少学者认为旧本的结局令《西厢记》不能摆脱传统大团圆的俗套。金圣叹虽然认为后一本是出自另一人之手,但是在具体的评点当中,他又一再肯定其中某些曲词之工,“便与《西厢》一般无二”。纵观全书,细究情节,我们可以观察到金圣叹试图调整故事情节,以达到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望。关于第五本才出场的郑恒这个人物,旧本中第一本以“楔子”开场,由老妇人口中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家口,在介绍莺莺时即说明她已许给郑恒,这样就为第三本赖婚,特别是为第五本争亲作了伏

笔。而金圣叹删去后一本,称郑恒不过是妇人用来拒婚的借口,不必实有此人、实有其事。从婚恋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才子佳人婚恋模式一定程度的改革。

金圣叹一开始就把《西厢记》定位一部讲述才子佳人爱情故事 的妙文。《西厢记》是中国才子佳人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在才子佳人爱情发展中必有小人从中作梗,历经曲折,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不管金圣叹是否从主观上故意改变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但他删除郑恒这一人物,并令崔张的爱情停止于张生取应在外不得结果,这在客观上已经做到了对才子佳人爱情模式一定程度的改变。

金圣叹也许基于两层考虑:一,崔张爱情受到阻挠最主要来源于以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郑恒小人乃“学唱公鸡,吃虱猴孙”之辈,只是先生一厢情愿“而犹自嫌,惟恐未臻极妙也”而把郑恒拉扯进来。第二,金圣叹让张生取应在外杳无音讯作为结尾,崔张爱情胎死腹中,反应出他已经意识到,在礼教严格的社会里,有着浪漫理想色彩的崔张之恋并不容易走向现实,甚至无立锥之地。悲剧的结尾具有强烈的美感张力,比起传统才子佳人欢天喜地安慰式的结局对人产生的震撼力和思考空间更大。

四、开明的两性关系之态度

自古以来,两性之间的吸引,爱慕之情的产生,直至婚姻家庭 的建立,整个过程无不受到“性”的牵引,“性”扮演着最基础最本真的角色。尽管孔老夫子说:“食,色,性也。”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未能如他所言那般把性看成一件自然的人类需求。在封建社会,性与爱是严重脱离的,性只被当成传宗接代的方式,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而不是作为培养爱的土壤。相反,把性爱视为“万恶之源”乃中国封建礼教一直奉承的真理,封建统治者和道学者否定广大民众对性爱的合理要求,并把性爱的情感表露、情感感受与淫欲混为一谈,使人们对性爱问题不得不讳莫如深。

金圣叹面对这个问题时态度则稍显开明。在第四本第四折后侯的总批里一开文就辩驳“《国风》好色而不淫”立论的荒谬性,提出“好色即淫”的观点。“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好色自解者也。”金圣叹是承认两性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认为那些淫欲者以好色之说作为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在他看来,好色和淫都是对“礼”的违背。一见钟情令崔张的爱情发展到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地步是必然的,道学者对偷期一篇文字的贬低和抑制也是必然的,金圣叹指出:“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但是金圣叹并不认为此篇文字鄙秽。原因有二:一是“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一个反问则一针见血地揭示两性关系是婚姻生活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二是“谁人手下有此文者乎?”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乃天地妙文,“文乃一人手下之文”,在如此妙文中,男女之事并不是刻意追求之事,而是为做出妙文服务的。金圣叹通过反唇相讥冬烘先生指出,鄙秽并不来源于文字,而来源于人心,如果心藏鄙秽之见,就会连妙文当鄙秽之文。可以看出,金圣叹不仅文学观念开放,而且对性爱持有正常、健康的心态。

但是金圣叹是否就完全赞同《西厢记》里描写崔莺莺和张生的偷情文字?旧本《西厢记》在一些地方确实写得比较露骨,

他还是给予客观的评价,并做适当的增删和修改。如他直接删除《酬简》里【后庭花】描写两人交欢一节。

由上分析,金圣叹的婚恋观是较复杂的,既对才子佳人理想模式的认可,又意识到理想爱情转化为婚姻在现实社会环境里的泡沫性结果。既对两性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明态度,又认识到伦理规范强大约束力。因此,金圣叹试图在自由开明以及封建约束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但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他二重性的观念的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时代原因。明中叶以后,带有原始资本色彩的商贸经济已经崛起,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社会风尚有所改变。首先,士人的立身行事徘徊于儒家传统生活模式与世俗人生追求之间。金圣叹具有的矛盾性就体现了这一点。其次,金圣叹评点中具有近代思想解放因素的启蒙思想,跟文学批评受到社会经济繁荣的气象激荡是密不可分的。再次,浪漫文学思潮的兴起。这股思潮表现出文人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追求,才子佳人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得到文人的支持。最后,金圣叹生活的吴中地区的文人文采风流而又放诞不羁,金圣叹早年游戏科场,以及大胆颠覆在文人心里根深蒂固的才子佳人的理想婚恋模式,也多少反映了此地区的才子风俗。

第二、金圣叹的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佛教具有辩证思维的缘起法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相结合,推动了哲学中影响深远的阴阳对立思想的发展,金圣叹在其文学评点中经常有意抽象出两两相对的情节设置技法,如“正文”与“闲文”的交迭配合,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对崔张爱情婚恋所表现出的情与礼的矛盾,可以看做他的带有辩证色彩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文学评点中的具体展现。

第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佛教认为,世事无常,人生虚妄,一切皆如梦幻,宣称“众生如幻如梦”,“昼夜梦中无异”。也就是把梦中所发生的跟现实生活等同起来,梦亦是现实,现实亦梦。金圣叹腰斩《西厢记》,将全局结束于张生草桥梦莺莺,使之变成一场生离死别的现实悲剧。这种悲剧观所依的主要理论根据,很大程度上源自佛教哲学思想和老庄道家哲学。

金圣叹生活在一个追求人性解放意识刚萌发而又封建集权高度发展的社会里,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明显打上时代和社会的综合烙印,反映到文学中则表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个性批评。婚恋观体现了他同封建时代无数文人追求的婚姻理想分道扬镳。他对才子佳人结局的冷静理智处理,已经闪耀着思想深度的光辉。面对情和礼的矛盾,他寻求一个既合乎人性需求又不违背社会客观约束的应对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封建主流思想的渐进摆脱。

参考文献:

- [1](元)王实甫,(清)金圣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3]吴正岚.金圣叹评传[M].南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4]钟锡南.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